长期护理保险如何塑造养老责任偏好？*

——基于政策反馈理论的分析框架

马琦峰　宁　晶**

【摘　要】本研究基于政策反馈理论，使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值得分匹配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影响。研究发现，长护险增强了老年人的社会化养老责任倾向，其影响通过资源、解释与学习三种政策反馈机制实现，在家庭照护负担较重、所在地区政策宣导力度较强及享受过待遇保障的群体中更突出。相关发现揭示了政策在非政治观念领域的溢出效应，并基于中国长护险“普惠筹资-精准给付”的混合型制度与老年群体非政治活跃性的独特情境，深化了对政策反馈机制多样性及情境依赖性的理论认知，为政策反馈理论在非西方福利体制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在未来长护险试点推进过程中，政府需积极回应老年人的社会化养老期待，同时重视并发挥家庭照护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长期护理保险；养老责任偏好；老年人；政策反馈理论；溢出效应

---

*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人工智能政策叙事与公众反馈效应：基于地方政府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723040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治理视域下中国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630002）、中国人民大学202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的资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护险研究小组提供的中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数据，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提供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 马琦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博士研究生；宁晶（通信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ningjing@ uibe. edu. cn。

引文格式：马琦峰，宁晶. 2026. 长期护理保险如何塑造养老责任偏好？——基于政策反馈理论的分析框架[J]. 公共管理评论，8(3)：177-201.

Cite this article：Ma Q F, Ning J. 2026. How doe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ffect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preferenc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policy feedback theory[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3): 177-201. (in Chinese)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已迈入老龄社会,截至 2025 年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 3.23 亿,占总人口的 23.0%[①]。伴随长寿时代来临与老龄化程度加深,中国失能老人规模持续扩大。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正式出台,旨在缓解老年失能导致的经济损失风险,帮助更多老年家庭走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现实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对。”[②]近年来,学界聚焦家庭照护(胡宏伟等,2024)、健康差距(朱铭来和康琢,2024)、政策协同(马琦峰等,2025)等领域,对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后文简称“长护险”)展开评估。然而,鲜有学者从福利态度的制度文化视角切入探究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

政策反馈理论(policy feedback theory)主张“政策塑造政治”,强调公共政策通过重构政治系统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影响政治进程(Pierson,1993)。该理论认为,政策的政治后果主要体现在其对公众态度与行为的塑造上(Campbell,2012),已在医疗、生育、住房等政策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张友浪和王培杰,2023;陈济冬等,2024;郭磊,2024),为理解社会保障制度对公众政治态度及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有力分析工具。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政策对投票行为、政策支持度等显性政治后果的影响(王培杰等,2022;Jacobs et al.,2022),即将公众预设为“政治行动者”,却忽视了政策在非政治观念领域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在此背景下,养老责任偏好作为公民对“谁来养老”的福利责任认知,反映了国家、市场与家庭在福利供给中的责任边界(陆杰华和谷俞辰,2024)。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态度,养老责任偏好不仅内嵌于社会文化规范中,更兼具制度认知与伦理判断的双重属性,是观察政策观念性溢出的关键维度。

基于此,本文从政策反馈视角切入,以 60 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使用 2014—2020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值得分匹配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尝试回答两个问题:长护险是否会对老年人的养老责任偏好产生影响?其作用机制为何?从理论认知层面看,以政策反馈为框架探究长护险对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具有必要性。其一,既有研究多将政策反馈机制局限于政治动员等显性范畴,普遍忽视其对个体责任认知与规范期望的深层塑造,因而亟需将分析视野拓展至观念结构层面,深化对政策认知渗透机制的理解;其二,在中国深厚“家文化”背景下,长护险作为国家介入家庭照护的制度安排,正在重塑政府与家庭在养老责任中的边界,若不从观念层面系统把握其溢出效应,则难以完整理解制度转型与文化规范之

① 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人民网:《习近平强调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16 年 5 月 29 日,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28387539,2026 年 7 月 17 日访问。

间的复杂互动逻辑。从政策实践角度看，此议题亦高度契合构建中国特色长期照护体系的现实需要。作为“政策的肌肤”与“社会的晴雨表”，公众福利态度是调整配套福利供给模式的重要依据（臧其胜，2016）。精准把握长护险试点地区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动态变化，不仅关乎政府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职能定位、政策路径选择与配套资金可持续性，也可为地方优化照护资源配置、推进长护险全国统筹提供经验参考，从而服务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国家战略。

二、文献回顾

养老责任偏好反映了公民对于“谁来养老”的福利态度倾向（范梓腾和宁晶，2021）。所谓“谁来养老”，即应该由谁承担主要养老责任并提供养老资源支持，而当其未履行相关义务时，应承担相应的后果（徐俊和风笑天，2012）。因既有研究关注视角、研究设计及数据资料的差异，学界的养老责任主体划分方式非常丰富，涵盖自我、子女、配偶、政府、社会及其他等主体（陆杰华和谷俞辰，2024）。但总体来看，其均围绕养老责任公私属性的“分水岭”展开。在此基础上，学界围绕不同群体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主要遵循三种路径：基于个体自利的微观视角、家庭结构的中观视角及福利体制的宏观视角（吴炜，2024）。

从微观视角出发，不同人口学特征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养老责任偏好上存在差异。其中，人口学变量构成了个体家庭角色结构化分工的基础（丁志宏等，2021）。研究发现，年轻一代普遍认为养老责任应由子女负责或三方共担（张波，2018），女性更易被赋予更多履行照护责任的期待（徐宏，2019），教育水平提升有助于提高个体对孝道的内在认同，而家庭经济状况越差的民众则越倾向于由政府承担养老责任（张争艳和王化波，2016）。

从中观视角来看，子女数量、子女结构等家庭因素在塑造养老责任偏好中扮演关键角色。实证研究表明，子女数量越多，越倾向于由子女承担养老责任。同时，相较于无子女家庭，拥有儿子或儿女双全的家庭对政府养老责任的偏好程度较低（张波，2018）。陆杰华等（2019）通过分析不同队列的养老责任偏好，发现在老年一代队列中，多子女者认为子女应承担更多养老责任，但对于中年一代，子女数量对其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从宏观视角出发，制度性因素在塑造养老责任规范认知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Zhao et al.，2021）。研究表明，长期照护政策调整可能引致家庭照护责任分配机制重构，推动传统孝道观念转变。以新加坡为例，近年来其推动老年人“在地老化”的政策实践，实为通过制度激励促使家庭成员在老年照护中承担更多责任，以强化公众传统养老责任偏好（Chin and Phua，2016）。此外，亦有学者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同样日益凸显（杨茜和段世江，2023）。

综上所述，针对公众养老责任偏好的研究已逐渐从微观视角转向宏观视角。然

而,针对社会保障领域中的重要制度变革,鲜有文献系统探讨长护险对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目前学界仅有两项研究涉足该领域:前者基于日本的调查证实,长护险实施后,公众的子女赡养责任认知比例出现下降(Tsutsui et al., 2014);后者基于中国的调查发现,长护险介入能够削弱老年人的子女养老责任偏好(Ma et al., 2025)。这些开创性研究虽在家庭文化层面取得重要突破,但研究视野仍存在一定局限,尚未从制度文化维度考察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机制,尤其是政策设计理念与民众福利认知之间的动态调适过程尚未构建完整的理论解释框架,亟待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补充完善。

三、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长护险是指被保险人因长期失能而产生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费用由所有投保人共担的财务损失化解机制,这一险种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荷兰,历经数十年发展,美、英、德、法、日、韩等发达国家都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长护险体系。我国采用试点方式逐步推进长护险政策,截至 2025 年,全国长护险参保人数已达 30854.44 万人,享受待遇人数 188.13 万人①。

总体来看,长护险的政策设计与实施具有三方面的典型特征:其一,制度设计层面,长护险依托社会互助共济机制进行筹资,旨在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而失能的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服务,有效回应了老年人的基本照护需求,能够缓解老年人及其家庭所面临的非正式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朱震宇, 2023; 胡宏伟等, 2024);其二,信息环境方面,地方单位通过多种渠道加强政策宣传、设立政策专员,有效提高了政策的知晓率与服务可及性,改善了政策信息传播环境,推动长护险制度深入人心(潘东阳和李玥,2024)。例如,重庆市北碚区开展了以“医保护航,长护暖心”为主题的长护险扩面提质政策宣传,旨在提升居民对长护险的知晓率和利用率;其三,政策框架层面,长护险已被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体系中,在政策话语与舆论场中被塑造为实现“老有所养”目标的重要制度安排(杜鹏和马琦峰,2025)。党的二十大报告等重要文件均明确提及“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也多次正面报道试点进展与社会成效,“长护险保障老年人”的政策叙事再次得到强化。这种高层次、多频次的政策阐释与公众沟通,为长护险影响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创造了有利的认知与态度形成条件。

(二)理论分析

政策反馈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对个体认知、态度与行为的塑造效应,并通过这

① 相关数据来自国家医保局发布的《2025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

种影响作用于未来的政策制定与政治发展过程(Pierson, 1993；郭跃等, 2020)。学界普遍认为,政策反馈产生的基本前提,是目标群体能够识别自身从政策中获取的利益,并理解这些利益的制度来源(Béland et al., 2022)。然而,政策对公众态度的塑造并非自动实现,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政策的制度设计,涉及资源供给、分配方式及其可感知性(王培杰等, 2022)；二是政策的信息环境,即政策执行过程中信息的透明度与传播效果(Mettler, 2011)；三是政策的框架与启动效应,即公共话语对政策利益的呈现方式,进而引导公众对政策利害关系的理解与判断(Haeder, 2026)。

基于上述理论逻辑,长护险会对老年人的养老责任偏好产生何种影响？相关研究表明,以医疗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制度会促使参保人群产生依赖心理,进而影响其行为表现。例如,有学者发现,医疗保险可承担部分就医费用,参保后个体会显著降低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更易出现吸烟、酗酒等不健康行为,从而引致事前道德风险(Dave and Kaestner, 2009)。亦有学者证实,老年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将引致医疗费用支出上涨的事后道德风险(张航空和马琦峰, 2024)。因此,长护险在促使更多老年人摆脱或减少对家庭养老责任主体依赖的同时(Ma et al., 2025),亦可能会增强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依赖,进而强化其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基于此,本文针对长护险与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之间的基准关系,提出研究假设 H1：

H1：长护险能够强化老年人的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增强其社会养老责任偏好。

长护险通过哪些作用路径来塑造老年人的养老责任偏好？政策反馈理论认为,政策对目标群体的影响主要通过资源效应(resource effect)、解释效应(interpretive effect)、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等多种路径展开(翟文康和邱一鸣, 2022)。基于此,本文提出长护险可能影响养老责任偏好的潜在机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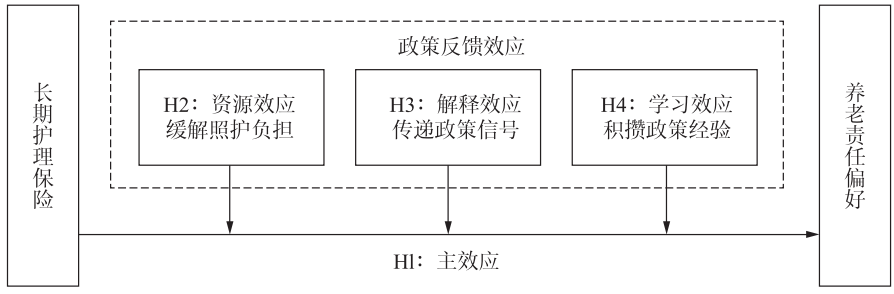


图 1 长护险影响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反馈分析框架

首先,资源效应强调政策通过物质或服务资源的再分配,改变行为主体的能力结构与行动选择(Pierson, 1993)。已有研究证实,医疗保险能够借助资源效应影响公众的态度与行为。例如,有学者在研究美国医疗平价法案时发现,医疗改革可通过提供物质资源的方式直接影响个体政治行为(Jacobs et al., 2022)。类似地,在试

点过程中,长护险建立在已有医疗保险制度基础之上,也可能会产生这种资源效应,即长护险会经由专业照护资源的再分配重塑老年人的养老责任偏好。实证研究表明,长护险不仅能显著降低老年人的平均家庭照护时长,还会对不同类型人群的照护负担产生差异化影响(朱铭来和何敏, 2021; 朱震宇, 2023)。因此,长护险试点过程会带来差异化的物质或服务分配,进而产生不同程度的资源效应。具体而言,家庭照护负担较重的老年人可能在长护险试点中获得更多服务资源,其养老责任偏好受到政策的形塑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围绕上述政策影响中可能存在的资源效应,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

H2: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存在资源效应。老年人的家庭照护负担越重,长护险对其社会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越突出。

其次,解释效应强调政策通过信息传递与意义建构,塑造公众的政策认知、价值观、身份认同和政治态度,进而影响其后续行为和政策偏好(Mettler, 2002)。具体而言,政策既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更是一种符号系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对社会角色、政府责任及自身权利的理解。解释效应在保险领域研究中亦得到验证,如郭磊(2024)基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政策的研究表明,企业对政策的认可度越高,其遵从行为越强。类似地,在长护险试点过程中,该效应主要表现为政策对养老责任归属的符号重构及对潜在受益者身份的认知强化。地方层面广泛的政策宣导,有助于提升当地老年人对长护险的政策认知与理解水平。当政策被阐释为保障老年群体权益时,潜在受益者的支持度随之提升,这将重塑公众的政策态度。因此,相较于对长护险认知不足的老年群体,在政策认知与理解水平较高的老年群体中,该政策对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在积极的政策待遇预期引导下,潜在受益者对政府与社会支持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这将强化其社会化养老责任倾向。基于此,围绕上述政策影响中可能存在的解释效应,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

H3: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存在解释效应。老年人所在地区政策宣导力度越大,长护险对其社会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越突出。

最后,学习效应强调在政策过程中或政策结束后,行动者会从既有政策实践中积累经验、调整认知,并将其作为后续政策选择或行为调整的重要依据(Pierson, 1993)。尽管目前学界对社保领域的政策学习效应关注有限,但已有研究在医疗保险政策实践中捕捉到这一现象,并在中国情境下获得初步证据(He et al., 2021)。在长护险领域,这一效应可能通过双重机制影响老年人的养老责任偏好:其一,长护险通过资格认定、服务供给等政策执行环节传递其价值导向,促使参保者逐渐理解社会化养老的制度逻辑;其二,长护险执行的规范性与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将强化老年人对公共养老制度的信任与依赖。长护险在为失能老年人提供现金、实物、服务等待遇保障的同时,也会促使其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政策实效并采取主动延续策略,推动其逐步接受社会化养老服务。因此,长护险对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影响,可能会更明显地作用于享受过待遇的老年群体。长护险的待遇享受经历能够帮助老年

人更好地积攒政策经验，可感知的积极政策体验及乐观的政策预期将促使该群体形成养老责任社会化的稳定路径依赖，进而强化其社会养老责任偏好。基于此，围绕上述政策影响中可能存在的学习效应，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

H4：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存在学习效应。相较于未享受过待遇保障的老年人，长护险对享受过待遇保障者的社会养老责任偏好影响更突出。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全国性社会追踪调查项目，调查对象为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该项目于 2014 年开展全国基线调查，随后进行多轮追踪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抽样范围覆盖全国除港澳台及海南、新疆、西藏外的 28 个省级行政区。本文使用 2014 年、2016 年、2018 年和 2020 年的四期调查数据，样本总量达 45790 个，涵盖受访者 22410 人。在初始数据基础上，本文对样本进行筛选。首先，由于 CLASS 调查起始年份为 2014 年，本文排除了此前就已开展长护险工作的上海与青岛两市；其次，本文逐期剔除了倾向值得分匹配过程中关键变量缺失及未成功匹配的样本；最后，剔除仅出现一期的非追踪调查样本，从而将分析数据转化为非平衡面板数据。最终保留基准回归分析的有效样本观测值合计 28256 个，共涉及受访者 10024 人。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养老责任偏好

本文因变量为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该变量通过 CLASS 问卷中“您认为老年人的照料应该主要由谁承担？”题目生成，题项共包括“政府”“社会”“子女”“老人自己或配偶”和“政府/子女/老人共同承担”5 个有效作答选项。综合学界既有养老责任态度的测量及分类方式（晏子，2018；陆杰华和谷俞辰，2024），本文选择从受访者的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视角切入，将回答“政府”“社会”和“政府/子女/老人共同承担”定义为具有社会养老责任偏好并赋值为 1，反之为 0。

2. 自变量：长护险试点

本文自变量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鉴于各试点城市政策实施时间不统一，为厘清处理组与对照组、实施前与实施后样本，本文利用 2023 年中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数据库（China pilot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olicy database，CLIP），梳理了国家两批 49 个长护险试点城市的政策文件，总结各试点城市制度特征（包括实施时间、参保资质及实施细则等），并结合 CLASS 数据库中的样本年份、地区及参保信息识别长护险试点覆盖人群。若受访者在调查当期被长护险制度覆盖，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需额外说明的是,成为试点城市并不代表城市内所有老年人均能享受长护险政策红利,与既有长护险文化影响研究保持一致(Ma et al., 2025),本文估计的是长护险政策的意向处理效应①。

3.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包括家庭照护负担、政策宣导力度与待遇享受经历,三个变量分别对应前文研究假设中的解释效应、资源效应与学习效应。变量操作详情如下。

(1) 家庭照护负担

子女是老年人家庭照料资源的重要供给主体,其提供的照料强度能直接反映家庭照护负担的大小。参考张云亮(2022)的研究,本文根据 CLASS 问卷中受访者子女家庭照料频率信息进行测量,并将子女家庭照料资源的供给强度归一化处理为取值范围 0~1 的连续变量,得到家庭照护负担的代理变量,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的家庭照护负担越重②。

(2) 政策宣导力度

政府会通过各种宣传途径塑造居民的政策认知(He et al., 2021)。报纸、网络平台等是地方政府向公众传播与阐释长护险政策的重要渠道,相关报道数量及网络检索指数能够直观反映各地的政策宣导力度。参考既有研究的测量方式(郑思齐等, 2013; Lü, 2014),本文分别采集了历次 CLASS 调查时点前省级官方报纸关于长护险的报道数量,以及省级 PC 端"长期护理保险"主题的网络检索指数。本文将这两组数据进行等权重加总并归一化处理后,合并为取值范围 0~1 的连续变量,作为政策宣导力度的代理变量,得分越高代表该地区的政策宣导力度越大③。相应地,这意味着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更高,对政策的理解更深刻。

(3) 待遇享受经历

受历史局限性影响,与其他大型社会追踪调查项目相同,CLASS 问卷未直接询问老年人的长护险待遇享受情况,但参照既有研究的识别方式(谢宇菲和封进, 2022; Chen and Ning, 2022; 朱铭来和康琢, 2024),本文仍可在结合不同试点城市长护险制度特征的基础上,依据地方性长护险政策落实范围及时间、所在城市老年人的失能状况(Barthel 量表中存在至少 1 项失能)、参保类型(符合对应试点城市的长护险覆盖范围)条件,尽可能准确地识别出待遇保障享受者,构建老年人待遇享受

① 本文估计长护险的意向处理效应主要因为:区别于长护险在健康、经济维度上的直接影响,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文化影响具有更强的政策溢出效应,即这类影响不只限于试点城市那些切实享受待遇保障的失能老人,还会同步影响试点城市中活力老人的养老预期,作用于其养老责任偏好。

② 鉴于不同来源的家庭照料具有一定替代性,故对于多子女家庭而言,本文主要选取家庭照料频率最高的子女来反映受访者的非正式照护获取情况。

③ 省级官方报纸报道数据来自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慧科新闻搜索研究数据库及《大众日报》(山东省)、《安徽日报》(安徽省)官方公众号,名单参见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71167022132150825/,检索主题及关键词包括"长期护理保险""长护险""护理保险""长期照护""失能照护";省级网络检索指数数据通过"省级行政单位名称+长护险主题"的 PC 端精确检索结果获得。

经历的代理变量(享受=1,未享受=0)。

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范梓腾和宁晶, 2021; Zhao et al., 2021; 凌文豪和郝一潼, 2022; 杨茜和段世江, 2023),本文选取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存活子女数量、子女同住情况、自评健康与慢性病数量作为控制变量。

表 1 汇报了所有变量的赋值详情及描述统计结果。

表 1 变量赋值详情及描述统计结果(N=28256)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养老责任偏好	具有社会养老责任偏好=1,不具有=0	0.51	0.50	1	0
长护险试点	目前被长护险制度覆盖=1,未覆盖=0	0.18	0.38	1	0
家庭照护负担	子女家庭照料资源的供给强度/分	0.51	0.36	1	0
政策宣导力度	省级官方报纸报道及网络检索指数的综合强度/分	0.31	0.23	1	0
待遇享受经历	享受=1,未享受=0	0.04	0.20	1	0
年龄	75 岁及以上=3,70~74 岁=2,65~69 岁=1,60~64 岁=0	1.57	1.10	3	0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1	0.50	1	0
受教育年限	接受教育总时长/年	5.53	4.27	16	0
婚姻状况	在婚=1,不在婚=0	0.72	0.45	1	0
户口类型	非农=1,农业=0	0.46	0.50	1	0
存活子女数量	存活子女数量/人	2.57	1.40	11	0
子女同住情况	同住=1,非同住=0	0.37	0.48	1	0
自评健康	健康=2,一般=1,不健康=0	1.27	0.75	2	0
慢性病数量	患有慢性病数量(种)	1.56	1.59	23	0

(三) 实证策略

本文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S-DID)相结合的实证分析策略,估计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影响。首先,为减小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潜在的自选择偏差,本文对数据进行 PSM 处理。该方法核心在于建构“反事实”分析框架,通过对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分阶段分析,计算组间平均差异以估计处理组养老责任偏好的平均处理效应。本文采用半径匹配(r=0.05)、核匹配(核函数及带宽默认值)及近邻匹配(k=1)三种不同方法进行逐期匹配,并保留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观测

值①。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长护险试点”视为准实验进行实证分析。然而,由于各试点城市政策实施时间不同,传统 DID 模型难以处理多时点政策干预问题。为此,本文在使用 PSM 方法平衡样本后构建 S-DID 模型,设定详情如下:

$$PRE_{itp} = \beta_0 + \beta_1 DID_{itp} + \gamma X_{itp} + \lambda_i + \nu_t + \varepsilon_{itp}$$

其中,PRE_{itp} 为养老责任偏好;DID_{itp} 为二元政策虚拟变量;X_{itp} 为控制变量;λ_i、ν_t 代表个体、时间固定效应;ε_{itp} 为误差项,β_0、β_1 和 γ 为待估参数;i、t 和 p 代表个人、年份和省级行政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参考既有政策反馈研究设计(He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6),构建了多组交互项回归模型,分别纳入政策虚拟变量与家庭照护负担、政策宣导力度及待遇享受经历三个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用于机制分析。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汇报了长护险影响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 1 仅纳入政策虚拟变量,模型 2 纳入了控制变量,模型 3 进一步加入双向固定效应,对比后可以发现,随着纳入变量的增多,模型拟合优度得到明显改善,解释力度持续增强,长护险的估计系数始终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长护险能够强化老年人的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增强其社会养老责任偏好,研究假设 H1 成立。

表 2 长护险对养老责任偏好的基准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长护险试点	0.099***	0.079***	0.048***
	(0.008)	(0.008)	(0.013)
年龄(65~69 岁=1)		0.022***	−0.001
		(0.009)	(0.011)
年龄(70~74 岁=2)		0.030***	0.002
		(0.009)	(0.017)
年龄(75 岁及以上=3)		0.041***	0.023
		(0.009)	(0.022)
受教育年限		0.004***	0.004***
		(0.001)	(0.002)
婚姻状况(在婚=1)		−0.000	0.022
		(0.007)	(0.017)

①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使用的均为半径匹配后的数据,历年的三种匹配方法均通过了样本平衡性检验,限于篇幅,正文未展示相关结果。

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户口类型(非农=1)		0.060***	−0.021
		(0.007)	(0.017)
存活子女数量		−0.027***	−0.016***
		(0.002)	(0.006)
子女同住情况(同住=1)		−0.021***	−0.022**
		(0.006)	(0.009)
自评健康(一般=1)		0.021**	−0.014
		(0.009)	(0.011)
自评健康(健康=2)		−0.030***	−0.062***
		(0.009)	(0.011)
慢性病数量		0.017***	0.021***
		(0.002)	(0.003)
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489***	0.473***	0.510***
	(0.003)	(0.014)	(0.027)
N	28256	28256	28256
R^2	0.006	0.026	0.578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二)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前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多种稳健性检验策略，重新评估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影响，结果详见图 2、图 3 及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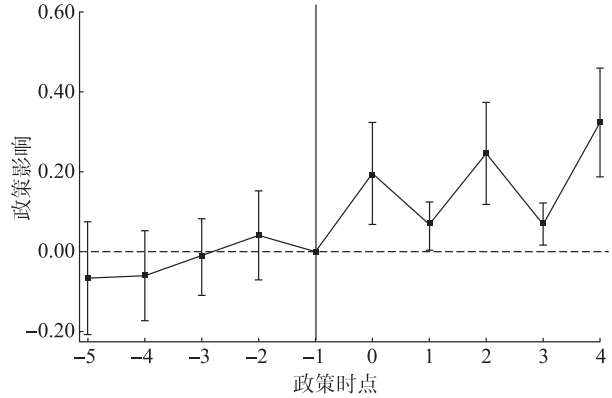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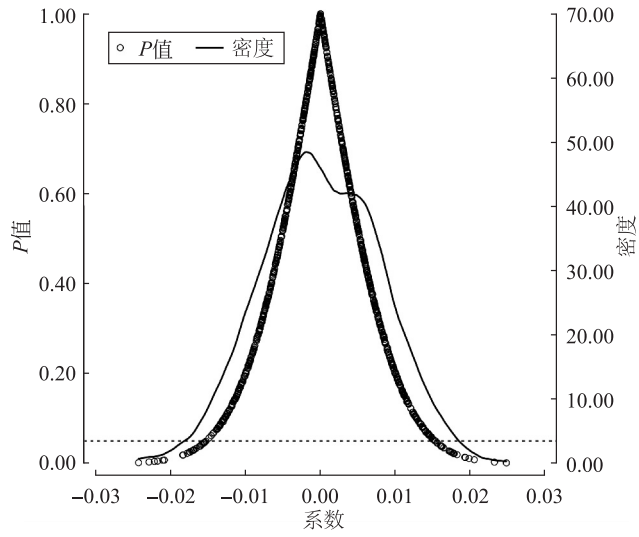


图 3 安慰剂检验:随机生成处理组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4 异质性稳健估计量	模型 5 逆概率加权-双重差分	模型 6 重构责任偏好变量	模型 7 个体聚类标准误	模型 8 剔除 2020 年样本	模型 9 排除地方试点干扰	模型 10 政策时点前移 1 年
长护险试点	0.041** (0.017)	0.060*** (0.015)	0.038** (0.017)	0.048*** (0.014)	0.028* (0.017)	0.045*** (0.013)	
长护险试点$_{t-1}$							0.021 (0.01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0.487*** (0.038)	1.653*** (0.036)	0.510*** (0.033)	0.457*** (0.032)	0.490*** (0.029)	0.515*** (0.027)
N	26352	28256	28256	28256	18390	24674	28256
R^2	—	0.610	0.578	0.578	0.607	0.593	0.578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 7 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其他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1. 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假定是有效识别 DID 方法的前提,要求在长护险试点实施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养老责任偏好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变动趋势。为此,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图 2 汇报了以长护险试点实施前一年为基准期、

95%置信区间内处理组与对照组养老责任偏好差异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政策干预前长护险试点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而在政策干预当期开始，这一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呈波动增强趋势，这一结果支持了平行趋势假定。

2.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鉴于渐进双重差分的估计量本质为多个个体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值，较晚处理组与较早处理组比较可能导致较大的负权重占比，进而引发估计偏误（Goodman-Bacon，2021）。为此，本文借鉴 Borusyak et al.（2024）提出的基于插补的异质性-稳健估计方法，利用未处理样本估算各处理组个体各时期的反事实结果，并通过计算其与真实结果的差值得到平均处理效应（刘冲等，2022）。如模型 4 所示，插补法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正，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逆概率加权-双重差分法

从政策实践角度出发，长护险试点城市选取可能并非完全随机，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风险。为此，本文采用逆概率加权-双重差分法（IPW-DID）进行稳健性检验。IPW 匹配能够基于倾向得分为每个样本赋予不同权重，有效校正样本选择偏差（Guadalupe et al.，2012）。具体操作中，本文先在全样本中估计倾向得分并进行匹配，再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加权估计。如模型 5 所示，在使用 IPW-DID 方法估计后，基准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4. 更换养老责任偏好变量

鉴于倾向养老责任社会化的老年群体内部亦存在偏好程度差异，为提高变量测量精确性，本文参考闫金山（2019）的处理方式，依次将回答“老人自己或配偶”和“子女”视为家庭养老责任偏好并赋值为 1，将回答“政府/子女/老人共同承担”视为混合养老责任偏好并赋值为 2，其他视为社会养老责任偏好并赋值为 3，进而获得取值 1~3 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代表受访者的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越明显。本文将新生成的因变量重新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如模型 6 所示，长护险试点的正向影响依然存在，且在 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5. 标准误聚类至个体层面

鉴于标准误的不同聚类层次可能会对模型估计结果造成冲击，为最大限度地规避这种潜在干扰，本文参照 Lei et al.（2022）的处理方法，使用个体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重新进行基准回归模型估计。如模型 7 所示，长护险试点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新模型与基准回归模型在结果上基本一致。

6. 剔除特殊事件冲击样本

考虑到 2020 年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养老责任偏好及长护险试点城市政策执行情况造成不同程度的外生性冲击，为尽可能地规避其干扰，本文剔除了 2020 年样本，仅保留 2014—2018 年三期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如模型 8 所示，长护险试点变量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新模型与基准回归模型在结果上基本一致。

7. 排除地方试点政策干扰

除 2016 年和 2020 年国家确立的两批共 49 个长护险试点城市外,亦有部分城市开展了地方性长护险试点探索。为避免同期地方试点政策对本文估计结果带来的潜在影响,本文剔除了开展地方试点工作的城市样本,并重新进行模型估计。如模型 9 所示,在排除地方试点政策的干扰后,长护险试点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再次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8. 时间与空间安慰剂检验

为更好地规避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干扰,本文采用虚构政策发生时间和随机分配实验组两种安慰剂检验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虚构政策发生时间。鉴于各试点城市长护险试点实施时间存在差异,无法虚构出标准化的政策处理时间,本文统一将处理组的真实处理时间前移一年,并基于虚构的"伪处理时间"再次进行模型估计。模型 10 的回归结果显示,将政策发生时间前移一年后,"伪处理时间"下长护险试点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0%的统计水平上不再具有显著性,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变化是长护险试点造成的。

二是随机分配实验组。本文以各试点城市长护险试点实施时间为基础,重新随机设定试点城市并生成"伪处理组"进行模型估计。鉴于"伪处理组"实际上并未受到政策冲击,理论上长护险并不会对这些老年人的养老责任偏好产生显著影响。图 3 展示了 1000 次随机抽样后回归系数的 p 值散点分布与概率密度分布情况。结果表明,伪长护险试点的回归系数与其对应 p 值呈正态分布,随机处理后的回归系数均值接近于 0,说明伪长护险试点并未产生显著政策影响,这为排除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干扰提供了佐证。

(三) 机制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揭示了长护险能够强化老年人的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增强其社会养老责任偏好。那么这种政策影响究竟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实现?基于前文政策反馈理论框架提出的三组研究假设,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依次纳入了长护险试点分别与家庭照护负担、政策宣导力度、待遇享受经历的变量交互项,以验证长护险影响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资源效应、解释效应与学习效应,检验结果详见表 4。

1. 资源效应:缓解照护负担

模型 11 的回归结果显示,长护险试点与家庭照护负担的变量交互项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家庭照护负担会正向调节长护险试点对老年人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的促进作用。长护险能够改善老年人获取正式照护资源的财务可及性并拓展服务项目内容,有助于减轻家庭成员的经济支出压力与日常照料负担,照护资源扩充强化了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影响,增强了其社会养老责任偏好,本文的研究假设 H2 得到验证。

表 4 调节作用分析

变量	模型 11 资源效应	模型 12 解释效应	模型 13 学习效应
长护险试点	−0.002 (0.020)	−0.004 (0.022)	0.049*** (0.013)
长护险试点×家庭照护负担	0.075*** (0.025)		
长护险试点×政策宣导力度		0.229*** (0.038)	
长护险试点×待遇享受经历			0.273*** (0.03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463*** (0.028)	0.767*** (0.030)	0.525*** (0.027)
N	28256	28256	28256
R^2	0.580	0.587	0.584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2. 解释效应：传递政策信号

模型 12 的回归结果显示，长护险试点与政策宣导力度的变量交互项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策宣导力度会正向调节长护险试点对老年人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的促进作用。地方报纸及网络等传播媒介能够向公众传播、释放长护险的政策信号，帮助辖区老年人更精准地理解相关政策内容，强化了长护险对其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影响，增强了其社会养老责任偏好，本文的研究假设 H3 得到验证。

3. 学习效应：积攒政策经验

模型 13 的回归结果显示，长护险试点与待遇享受经历的变量交互项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待遇享受经历会正向调节长护险试点对老年人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的促进作用。老年人在切身享受长护险待遇的过程中通过观察、体验、反思、总结等方式积攒了丰富的政策经验，有助于加深对政策的认识与理解，并逐渐形成政策信任与路径依赖，强化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影响，增强其社会养老责任偏好，本文的研究假设 H4 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政策反馈视角切入，采用 2014—2020 年四期 CLASS 微观数据，运用倾向

值得分匹配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护险能够强化老年人的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增强其社会养老责任偏好,相关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影响通过三个作用路径实现,即缓解照护负担的资源效应、传递政策信号的解释效应,以及积攒政策经验的学习效应。家庭照护负担越重、所在地区政策宣导力度越大及享受过待遇保障的老年人,越有可能在长护险的政策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形成社会养老责任偏好。

(二) 学理贡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对长护险政策效应的理解,更为政策反馈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与既有研究相比,其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揭示了长护险在社会责任认知层面产生的政策反馈溢出效应,突破了传统政策反馈理论对政治性后果的单一聚焦,拓展了该理论的作用范畴与解释边界。本文将养老责任偏好视为公民对国家、市场与家庭在养老责任分配中的认知倾向与伦理判断,以此区别于以投票行为、政策支持度等为代表的直接政治态度变量,凸显其作为深层福利观念结构的非政治属性。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虽以失能照护为制度初衷,其影响却广泛渗透至公民的责任伦理、文化预期与规范认同等非政治观念领域,形成超越制度设计初衷的认知溢出。长护险通过资源再分配、政策信号传导及参保者经验学习等机制,为老年人提供了重新审视国家与家庭之间养老责任边界的现实情境,进而潜移默化地重塑其对于“谁来养老”这一社会契约基本问题的认知图式。这一发现不仅与“政策偏好跨领域溢出”的相关研究(Wang and Zhang, 2025)相呼应,更从观念结构的深层维度拓展了政策反馈理论的解释视野,表明公共政策除了直接塑造政治行为与态度之外,亦在更隐蔽的层面深度参与公民认知模式与社会规范的重构过程。由此,本文丰富了政策反馈理论在非政治观念塑造方面的机制性内涵,也为理解福利制度在社会价值建构中的潜在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切入点。

二是基于中国场景揭示了政策反馈效应的制度依赖性与文化嵌入性,为理解这一理论在不同政治社会语境中的适用性与变异机制提供了新证据。在政策设计层面,国内长护险采取“普惠筹资”与“精准给付”相结合的混合型制度模式:依托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实现筹资广覆盖,聚焦中重度失能人群实现待遇精准给付(杨团, 2016; Villalobos Dintrans, 2020)。本文指出,该制度能够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借助精准的受益体验增强目标群体对社会化养老的认同,进而在提升公众信任与强化制度认同之间形成正向反馈闭环。这一机制不仅为厘清混合型福利制度下政策反馈的独特路径提供了重要案例,也为阐释政策稳定性与制度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补充了理论新知。在研究对象层面,尽管中国老年群体通常政治参与度较低,常被视为“已被保护的公众”(Starr, 2013),但本文证实,他们在养老保障制度转型过程中能

够敏锐捕捉政策信号，并据此调整对养老责任归属的认知与期待。这表明政策反馈的动员效应并非局限于政治活跃群体，同样适用于传统认知中的“政治沉默”群体，从而拓宽了政策反馈理论对非活跃公众认知能动性的理解边界，增强了该理论在不同政体与文化背景下的解释力与适用性。

（三）政策启示

探究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能够帮助学界更全面地理解现阶段我国长护险的政策效应，对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护险制度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一方面，在长护险实施过程中，政府应以积极履职的态度回应老年人的社会化养老期待。长护险能够强化老年人的养老责任社会化倾向，为此，政府应抓住长护险的政策优势，推动更多优质普惠的老年照护服务资源下沉基层。同时，持续扩大长护险的制度覆盖范围，优化长期照护资源配置结构，在服务内容、服务形式上加大投入，满足多样化老年照护需求，让更多老年人切实从长护险制度中受惠，增强老年群体的社会政策信任，为长护险制度全国推广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充分认识并发挥家庭成员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中的重要作用。尽管长护险有助于减轻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护负担，但亦会强化老年人的社会养老依赖。伴随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及传统家庭结构变迁，这种依赖可能会为长护险基金支出的可持续性带来较大威胁。为此，应积极借鉴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通过为家庭照护人员提供专业技能培训、照护喘息服务等方式，持续调动家庭成员的主体积极性，保障长护险制度长效可持续运行。

（四）研究局限

本文基于政策反馈理论揭示了长护险对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的政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拓展了该理论在非西方福利体制下的适用边界，但受数据条件与文章篇幅所限，仍存在以下局限。其一，受制于现阶段国内相关社会追踪调查项目的问卷设计及组织形式，本文仅依托 CLASS 数据库就老年人养老责任偏好议题展开分析，缺乏多源流数据库的交叉验证，这可能会削弱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其二，在机制变量测量方面，本文使用的“政策宣导力度”与“待遇享受经历”均为基于现有数据条件构建的代理变量，前者虽能反映地区层面的政策传播强度，但难以精准捕捉老年人个体对政策的知晓程度与理解水平。后者虽结合参保状态、失能情况等关键信息进行推断，但仍可能与实际待遇享受经历存在偏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制效应识别的精准性；其三，受数据结构及文章篇幅限制，本文未能对多个重要相关议题展开研究，包括长护险对不同老年群体及其家庭成员养老责任偏好的异质性影响、家庭结构及孝道文化在政策影响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地方自主试点城市与国家试点城市之间的潜在效果差异等，这些议题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

陈济冬，王磊，臧雷振. 2024. 保障性住房政策促进基层善治：基于政策反馈理论的实证探索[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107-118.

Chen J D，Wang L，Zang L Z. 2024. Enhancing local governance through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y：An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policy feedback perspective[J].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2)：107-118.（in Chinese）

丁志宏，陈硕，夏咏荷. 2021. 我国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责任认知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 兰州学刊，(1)：168-186.

Ding Z H，Chen S，Xia Y H. 2021. Study on the cognitiv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among only-child parents in China[J]. *Lanzhou Academic Journal*，(1)：168-186.（in Chinese）

杜鹏，马琦峰. 2025. 中国老龄问题研究年谱[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4(2)：94-116.

Du P，Ma Q F. 2025. Chronological research on aging issues in China[J]. *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24(2)：94-116.（in Chinese）

范梓腾，宁晶. 2021. 技术变革中的福利态度转变——自动化替代对个体养老责任偏好的影响[J]. 社会学研究，36(1)：160-179，229.

Fan Z T，Ning J. 2021.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welfare attitude：How automation replacement affects individuals' eldercare preferences[J]. *Sociological Studies*，36(1)：160-179，229.（in Chinese）

郭磊. 2024. 目标群体异质性影响政策遵从的双重机制研究——以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所有制差异为例[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1)：90-99，127.

Guo L. 2024. The dual mechanisms of heterogeneity between target groups affecting policy compliance：The case of ownership gap in enterprises' contributions to pension insurance[J].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1)：90-99，127.（in Chinese）

郭跃，何林晟，苏竣. 2020. “工具-叙事-反馈”：一个行为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J]. 中国行政管理，(5)：71-78.

Guo Y，He L S，Su J. 2020. Instruments，narrative and feedback：A framework of behavioral public policy[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5)：71-78.（in Chinese）

胡宏伟，刘雨佳，张开然. 2024.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与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料安排——基于政策设计差异的检验[J]. 江西社会科学，44(9)：162-174.

Hu H W，Liu Y J，Zhang K R. 2024. Pilot programs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nd family care arrangements for disabled elderly—testing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policy design[J]. *Jiangxi Social Sciences*，44(9)：162-174.（in Chinese）

凌文豪，郝一潼. 2022. 老年人对政府养老责任的认知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 社会保障研究，(1)：14-25.

Ling W H, Hao Y T. 2022. Research on the cognition of the elderly on the government's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J].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1): 14-25. (in Chinese)

刘冲, 沙学康, 张妍. 2022. 交错双重差分：处理效应异质性与估计方法选择[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39(9): 177-204.

Liu C, Sha X K, Zhang Y. 2022.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and choice of estimation[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39(9): 177-204. (in Chinese)

陆杰华, 谷俞辰. 2024. 社会网络对中青年群体养老责任认同的影响研究——基于 CGSS 2018 年数据的检验[J]. 人口学刊, 46(1): 81-95.

Lu J H, Gu Y C. 2024.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 recogni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elderly care among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GSS 2018 data[J]. *Population Journal*, 46(1): 81-95. (in Chinese)

陆杰华, 王馨雨, 张雁雯. 2019. 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代际队列的养老责任观念变化探究——来自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验证[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3(2): 105-115.

Lu J H, Wang X Y, Zhang Y W. 2019. Changing norms of eldercare responsibilities across generational cohort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evidence from CGSS of 2015[J].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3(2): 105-115. (in Chinese)

马琦峰, 孙可心, 郝勇. 2025. 老年医疗护理服务试点的政策效应研究——兼论长护险、医养结合政策协同的影响[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18(2): 16-23.

Ma Q F, Sun K X, Hao Y. 2025. Research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elderly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s pilots: Als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synergy[J].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18(2): 16-23. (in Chinese)

潘东阳, 李玥. 2024. 长期护理保险信息"破壁"何以可能、何以可为[J]. 社会建设, 11(4): 34-50.

Pan D Y, Li Y. 2024. How to break down the information barriers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J]. *Social Construction*, 11(4): 34-50. (in Chinese)

王培杰, 彭雨馨, 张友浪. 2022. 政策设计、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基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反馈效应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15(5): 27-48, 196-197.

Wang P J, Peng Y X, Zhang Y L. 2022. Policy design, policy support, and fertility preference: The feedback effe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5(5): 27-48, 196-197. (in Chinese)

吴炜. 2024. 谁来养老：养老福利态度的城乡差异[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6(3): 132-147.

Wu W. 2024. Who will care for the elderly: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toward

old-age welfare[J].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46(3): 132-147. (in Chinese)

谢宇菲, 封进. 2022. 长期护理保险缩小了失能老人健康差距吗?[J]. 保险研究, (10): 19-33.

Xie Y F, Feng J. 2022. Has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resolved disparities in health for disabled elderly Chinese?[J]. *Insurance Studies*, (10): 19-33. (in Chinese)

徐宏. 2019. 中国农村人口养老责任观念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GSS2015 的实证分析[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9(3): 138-146.

Xu H. 2019.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cept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ural popul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 2015[J].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69(3): 138-146. (in Chinese)

徐俊, 风笑天. 2012.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责任与风险研究[J]. 人口与发展, 18(5): 2-10.

Xu J, Feng X T. 2012. Research on responsibility and risk of old-age support of one-child family in China[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18(5): 2-10. (in Chinese)

闫金山. 2019. 家庭对青年养老责任分担态度的影响研究——基于 4 期 CGSS 调查数据[J]. 调研世界, (9): 43-48.

Yan J S. 2019.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on the attitude towards youth's sharing obligations of supporting elderly parents—based on 4 CGSS survey data[J].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9): 43-48. (in Chinese)

晏子. 2018. 倾向传统还是走向现代: 性别意识与养老责任态度——基于中国、日本、韩国的比较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11(6): 112-136, 212.

Yan Z. 2018. Prone to tradition or modernity: Gender ideology and eldercare responsibilities—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1(6): 112-136, 212. (in Chinese)

杨团. 2016. 中国长期照护的政策选择[J]. 中国社会科学, (11): 87-110, 207.

Yang T. 2016. Policy options for long-term care in China[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1): 87-110, 207. (in Chinese)

杨茜, 段世江. 2023. 城乡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影响因素及变迁趋势——基于时期和队列视角分析[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8(5): 100-112.

Yang X, Duan S J. 2023.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hanging trends of elderly people's cognition of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alysis based on period and cohort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48(5): 100-112. (in Chinese)

臧其胜. 2016. 政策的肌肤: 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及其本土意义[J]. 公共行政评论, 9(4): 171-190, 209-210.

Zang Q S. 2016. The skin of soc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frontier and local significance of

welfare attitude research[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9(4): 171-190, 209-210. (in Chinese)

翟文康, 邱一鸣. 2022. 政策如何塑造政治？——政策反馈理论述评[J]. 中国行政管理, (3): 39-49.

Zhai W K, Qiu Y M. 2022. How do policies shape politics? —The review on policy feedback theory[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3): 39-49. (in Chinese)

张波. 2018. 中国谁来养老？——基于中国人养老责任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99-109, 170-171.

Zhang B. 2018. Who will provide resources for the age in China? —Cognition on Chinese's old-age insurance responsibi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99-109, 170-171. (in Chinese)

张航空, 马琦峰. 2024. 医疗保险会引致道德风险吗？——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17(10): 9-16.

Zhang H K, Ma Q F. 2024. Does medical insurance cause moral hazard: Take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s an example[J].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17(10): 9-16. (in Chinese)

张友浪, 王培杰. 2023. 公共政策反馈如何影响政府机构变迁？——基于生育政策的历史追踪分析(1949—2021)[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4(1): 74-88.

Zhang Y L, Wang P J. 2023. How do policy feedback effects shape institutional reforms in China's public policy process? A historical tracking analysis based on the fertility policy (1949—2021)[J].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4(1): 74-88. (in Chinese)

张云亮, 柳建坤. 2022.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及机制分析——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2014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4): 117-131.

Zhang Y L, Liu J K. 2022. The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on elderly'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its mechanism analysi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2014 data from the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4): 117-131. (in Chinese)

张争艳, 王化波. 2016. 珠海市老年人口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学刊, 38(1): 88-94.

Zhang Z Y, Wang H B. 2016. Analysis of the desire on old-age support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 in Zhuhai City[J]. *Population Journal*, 38(1): 88-94. (in Chinese)

郑思齐, 万广华, 孙伟增, 等. 2013. 公众诉求与城市环境治理[J]. 管理世界, 29(6): 72-84.

Zheng S Q, Wan G H, Sun W Z, et al. 2013. Public demands and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9(6): 72-84. (in Chinese)

朱铭来，何敏. 2021. 长期护理保险会挤出家庭照护吗？——基于 2011—2018 年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保险研究，(12)：21-38.

Zhu M L, He M. 2021. Doe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crowd out informal care? — Evidences from 2011—2018 CHARLS data[J]. *Insurance Studies*, (12): 21-38. (in Chinese)

朱铭来，康琢. 2024. 长期护理保险能够缓解健康不平等吗？——来自 CHARLS 数据的证据[J]. 保险研究，(4)：90-100.

Zhu M L, Kang Z. 2024. Can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lleviate health inequality? — Evidences from CHARLS[J]. *Insurance Studies*, (4): 90-100. (in Chinese)

朱震宇. 2023. 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家庭照料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37(3)：97-114.

Zhu Z Y. 2023. The effect of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on family care for the elderly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37(3): 97-114. (in Chinese)

Béland D, Campbell A L, Weaver R K. 2022. Policy feedback: How policies shape poli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rusyak K, Jaravel X, Spiess J. 2024. Revisiting event-study designs: Robust and efficient estimation[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1(6): 3253-3285.

Campbell A L. 2012. Policy makes mass politics[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5(1): 333-351.

Chen H, Ning J. 2022. Public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cheme and informal care use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in China[J]. *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30(6): e6386-e6395.

Chin C W W, Phua K H. 2016. Long-term care policy: Singapore's experience[J].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28(2): 113-129.

Dave D, Kaestner R. 2009. Health insurance and ex ante moral hazard: Evidence from Medica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Care Finance and Economics*, 9(4): 367-390.

Goodman-Bacon A. 2021.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25(2): 254-277.

Guadalupe M, Kuzmina O, Thomas C. 2012. Innovation and foreign ownership[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7): 3594-3627.

Haeder S F. 2026. What information elicits policy enthusiasm? Older Americans, the ACA, and Medicare[J].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51(1): 1-43.

He A J, Ratigan K, Qian J W. 2021. Attitudinal feedback towards sub-national social policy: A comparison of popular support for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23(3): 350-371.

Jacobs L R, Mettler S, Zhu L. 2022. The pathways of policy feedback: How health reform

ampbell A L, Weaver R K.2022.Policy feedback: How policies shape politics

influences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articipation[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50(3): 483-506.

Lei X Y, Bai C, Hong J P, et al. 2022.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nd th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and their families: Evidence from China[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96: 114745.

Lü X B. 2014. Social policy and regime legitimacy: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8(2): 423-437.

Ma Q F, Ning J, Chen H. 2025. Changes of filial responsibility norms under public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China[J]. *Geriatrics & Gerontology International*, 25(4): 606-619.

Mettler S. 2002.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to civic engagement: Policy feedback effects of the G.I. bill for World War II veteran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2): 351-365.

Mettler S. 2011. The submerged state: How invisible government policies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ierson P. 1993. When effect becomes cause: Policy feedback and political change[J]. *World Politics*, 45(4): 595-628.

Starr P. 2013. Remedy and reaction: The peculiar American struggle over health care reform[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sutsui T, Muramatsu N, Higashino S. 2014. Changes in perceived filial obligation norms among coresident family caregivers in Japan[J]. *The Gerontologist*, 54(5): 797-807.

Villalobos Dintrans P. 2020. Designing long-term care systems: Elements to consider[J].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32(1): 83-99.

Wang H B, Gong X, Zhang K R. 2026. How does social insurance policy affect citiz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olicy feedback theory[J].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43(1): e70012.

Wang P J, Zhang Y L. 2025. Cross-domain policy feedback effects on mass publics[J]. *Governance*, 38(2): e12905.

Zhao L T, Qian J W, Shan W. 2021. Filial piety, pension policy 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3): 112-131.

How Doe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ffect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Preferenc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Policy Feedback Theory

MA Qifeng [1] NING Jing [2]

(1. School of Population and Healt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continuous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scal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with functional impairments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which brings heavy care pressure to families and generates a huge social care demand. Against this backdrop,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LTCI) has become a key policy tool for addressing the risk of elderly disability and alleviating the burden of family care, and has been piloted and promoted nationwide.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its economic and care effects, and few studies expl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ulture how LTCI shapes the older adults'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preferences.

Policy feedback theory emphasizes the proposition that "policies shape politics," holding that public policies can reshape political systems and environments, thereby influencing the political process. As a major welfare policy innova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a's LTCI may have a policy feedback effect on the policy preferences of the older ad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feedback,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swer two core questions: (1) How does LTCI affect the older adults'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preferences? (2) Through what mechanisms does LTCI shape these preference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analyzed data from four phases of the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This study estimated the causal impact of LTCI on the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preferences of the older adults aged 60 and above by adopting a progressive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and combin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his empirical strategy helps alleviate endogeneity problems such as selection bias and omitted variables, thereby ensuring more reliable result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LTCI has strengthened the older adults' preference for socialized eldercare responsibilities, increasing support for government or societal rather than individual or familial provision of eldercare.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indicate that these results are robus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LTCI mainly influences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preferences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 resource effect (alleviating the burden of care), interpretation effect (transmitting policy signals), and learning effect (accumulating policy experience). Older adults with heavier family care burdens, greater policy promotion efforts in their regions, and those who have personally benefited from LTCI coverage are more likely to show a stronger preference for socialized eldercare responsibilities.

This study provides two key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policy feedback theory. Firstly, it reveal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LTCI in non-political fields, which is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reshaping the older adults' perception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old-age care-this dimension is rooted in ethical judgment and cultural norms rather than explicit political attitudes. This expands the scope of the theory from traditional political outcomes to the cognitive and normative domains, clarifying how public policies reconstruct citiz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contract. Secondly, based on the Chinese context, it highlights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ependence of the policy feedback mechanism. The hybrid system design of LTCI and the responsiveness of the non-politically active older adults indicate that the policy feedback mechanism is shaped by a specific welfare framework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ereby promo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theory under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Keyword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preferences; older adults; policy feedback theory; spillover effect

投稿日期：2025/6/12　　**送外审日期**：2025/6/17　　**首轮外审完成日期**：2025/7/21
录用日期：2025/12/29　　**最终修回日期**：2026/5/26